

试论会计史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作用

吴大新

“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商业伦理的败德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何在新时代商科教育尤其是会计教育中彰显中国智慧，使中国会计教育能够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合格人才，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课程建设“主战场”，科学合理地开展会计课堂教学。而作为会计学科之“源”，会计史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在价值引领方面的作用亟需充分发挥。

然而，当前中国会计史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这不仅表现在，仅有少数高校开设了会计史课程；更主要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对会计史的学术旨趣及研究内容等存在诸多误解。实际上，会计史不是会计史实的堆积，不是种种会计思想的介绍，不是各色会计著作的编年纪事，也不是为一些会计学家作传记，尽管这些都是会计史研究的重要“原材料”。会计史所要勾画的，是会计发展的整个历程，也就是会计事件所折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改变会计史研究中“见物

不见人”的倾向，探究会计对人的意识、行为的影响，是会计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学术路径。这样的会计史教育才有可能充分挖掘历史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教育本身就有价值引领的功能。梁任公曾言：“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者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笔者认为，全面落实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道德修养、国家安全意识等思政教育要求，是会计史教育的题中之义。

历史知识是国民必备基本素养之一。钱穆先生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又说：“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知识的“供给”，需要立足于时代的具体情势。换言之，历史知识也需要与时俱进。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的国民素质、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已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通过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新的历史叙事，讲好中国故事。

会计史显然可以为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提供合适的知识。中国古代典籍中不乏会计文化方面的记录，比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会稽者，会计也”；《吴越春秋》所载大禹的“大会计治国之道”；唐刘禹锡《九华山歌》中的“轩皇封禅登云亭，大禹会计临东溟”等，都可从会计的角度印证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民国时期，潘序伦与徐永祚“关于中式簿记前途的论战”也值得特别关注。前者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者是本土会计师，两人虽是论敌，却成为挚友，是因为他们怀揣共同的强国梦。通过挖掘“四史”的红色会计元素，可以从会计的角度探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秘诀，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比如，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倡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再如，1958年至1978年间，中国会计界立足国情，创造出“财产（钱物）收付记账法”“现金收付记账法”“资金收付记账法”等

多种记账方法,进行了独立自主创建中国会计制度的可贵探索。

通过会计史教育培养历史思维,无疑也有助于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提升。史学讲究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因此,我们应着力培养求真意识,实事求是地看待已取得的成绩和尚存在的不足。史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强调以“他者之镜”反观自己。这就需要进行文明之间的比较与互鉴,不但要取长补短,还需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从而养成一种容忍的态度。会计甚至还是一种修身之道。宋人刘宰有言曰:“士友当亲,而贤否不可不辨;财利当远,而会计不可不明。”实为人生格言。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是孔子的崇拜者,他把《论语》作为经商和立身处世的准绳,其晚年所著的《论语与算盘》,处处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此外,前述“关于中式簿记前途的论战”,是论战双方基于平等立场、从学理上展开的激烈交锋,凸显了自由、冷静、尊重、包容的学术品格,树立了学术争鸣的典范,尤其值得当今学人深思。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认为,研究历史差不多就是一种“古物收集癖”的表现,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应该承认,历史学家对于“古物”的兴趣确实要比其他人多一些,但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特征,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更加关心现实;实际上,正是对现实问题的关心才让他们去研究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会计史当然也关心现实问题。近年来引发热议的“扇贝去哪了”、康美药业虚假财务陈述案等事件,同样也是会计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新《证券法》将虚假信息披露的处罚上限从6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提高了法律的威慑力,但根据罪罚均衡原则,对有些严重犯罪的惩处或许还需进一

步加重。“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论语·为政篇》讲:“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对案件的审理以及法律条款的修改,应汲取历史智慧,及时回应民意(如采取开门立法的方式),将公民的正当良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也是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这一天然权利的尊重。又如,唐代寺院民主、公开的“算会”制度,也可以为当前热议的财会监督提供思路,当然也是宪法法治教育的历史素材。

就国家安全而言,会计史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借鉴。欧盟会计战略的变迁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席位之争即是绝佳案例。为了应对美国会计霸权(American accounting hegemony),欧盟采取了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通过借助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一民间国际组织,成功改变了长期受制于美国的尴尬局面,有效维护了自身利益。另外,当前全球会计标准仍在实质上为美国所主导,其以资本市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会计研究模式、会计教育模式和会计实践,不仅应为2007年开始并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负重要责任,也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的重要诱因。中国会计教育深受美国会计模式的影响,因此,未来的发展需尽力避免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不难发现,会计史天然地包含着课程思政建设所需的丰富资源。不过,要想充分发挥会计史的作用,还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清楚认识课程思政的定位。课程思政并不等于思政课程。工业化时代的学科分工造成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离,使得教育越来越功利化,这引起大家越来越多的反思。国外也有学者批评当前的高等教育,认为“当前的学术体系歪曲了培训、教育以及学

习之间的区别”,使得大学成为一个“知识工厂”。课程思政的提出正是对教育本质的反思以及向育人这一教育本体的回归。二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投身会计史研究和教学。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部署,教师队伍是“主力军”,课程建设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然而,当前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现状恐怕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想要打造会计史教师队伍这一“主力军”,就需要充分理解会计史研究在“投入——产出”比方面的困难,并在师资培养、职称评聘、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给与特殊支持。另外,在学生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也需要凸显会计史课程的重要性,并在大学低年级尽早开设这一必修课程。相信在多方合力的推动下,会计史可以更好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簿记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18BGL075>、山东财经大学2020年度课程思政教改专项“会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刘黎静

主要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新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85.
- [2] 钱穆. 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引论2.
- [3] 阿罗诺维兹. 知识工厂: 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教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142.